

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汪维辉—— 在汉语的长河中“打捞”真相

■ 本报记者 王雨红 李娇伊

汉语有文字记载的历史,就如一条流淌了3000多年的河流。

这条河流太浩瀚了。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汪维辉已经遨游了40余年,追溯这些水滴的“前世今生”,看它们如何流经不同的时代,又如何如何在不同的地方分岔与汇合。

但汪维辉不急不缓,即便在数字化时代,他依然保持朴素的学术方式——一个字一个字地读,一个词一个词地追,然后,告诉世人古人怎么说话,古人的话怎么变成今天这样。他是首位系统地将时间与空间结合的汉语词汇学者,被业界视为“领路人”。

“从事汉语词汇研究,所有材料必须来自历史文献,不能自造例子,不能想当然,如果没有扎实的功底是难以胜任的。”汪维辉的办公室里,书架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,铺满两面墙。

再过两年,汪维辉将年满70岁,不过只有那一头全白的发色,能看出些许“古来稀”的模样。他至今仍坚持每天伏案研究,站立讲台,在汉语的长河中“打捞”更多真相。

理清疑难问题有无穷的乐趣

“语言实际上是一个交际工具,它总是能够适应人类的交际需要,有个性,也有自我调节功能。”汪维辉说话不急不缓,带着宁波乡音的普通话里,透着一股学者的笃定。

刚坐下,汪维辉就向我们展示了他的“功力”。当得知记者一位来自嘉兴、一位来自山西临汾时,他立即以“寻找”一词举例:“北方话一般说‘找’东西,但晋南地区的方言说‘寻’东西,对吗?”

当记者说出方言后,才发现“找”的语义对应的发音确实是“寻”!汪维辉大笑解释:“晋语还有人声,它和吴语一样老。‘寻’是很古老的词,所以在你们的方言中保留了下来,而‘找’是后来才出现的。”

汪维辉研究的核心,正是在于将词汇研究从传统的“考词释义”提升到“词汇史”的高度,并系统梳理这些“概念名称的变迁”,揭示汉语词汇演变的规律。

清代以前的学者,尤其是乾嘉学派,做训诂学的目的是解经、阐明词义,他们并没有有意识地研究词汇是如何演变的。但当时一些大学者已经有了“史”的眼光:段玉裁在《说文解字注》里就曾指出,“鞋子”在先秦叫“屨”,汉代叫“履”,先秦的“履”是走的意思,到汉代变成了名词。

“这其实已经是一种历时演变的观察,只是零星散落在注释中,没有系统化。”汪维辉说。

为了使词汇研究既能把握时代性,又能观照地域性,他创造性提出“纵横结合”法——纵向是词汇的历时演变,横向是方言的共时分布。

不过,词汇研究工程量巨大,再详尽的著作也不能把所有的词一一论及。

有一回,学生蔡浩昌课后与汪维辉讨论,“是”作为系词(即判断词)是何时出现的。当时,学术界普遍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星象图和秦墓出土的“日书”类文献为据,认为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,其中的重文符号“=”即系词“是”。但蔡浩昌提出这个符号有新的解读,“可能并不是系词‘是’”。

汪维辉把这事记在心里,并请蔡浩昌把搜集的文献资料发给他。“我一看,果然有了新说法,这些文献里的‘=’其实不是重复上文的‘是’,而是‘谓’的重文符号,因此并不是系词。”

以此为契机,汪维辉还特意写了一篇名为《西汉以前究竟有没有系词“是”》的文章,并把这个例子编进了《汉语史讲义》这本教材。

“做这种学问,寂寞吗?”我们不禁好奇。

汪维辉笑了。那种笑里依然有一种笃定:“把一个疑难问题搞清楚了,我觉得有无穷的乐趣。”

汉语词汇,如奔涌不息的活水,从上古流到今天,从文献流进方言,也将从汪维辉的书桌,流向一代代后来者的笔端。

追问语言最活跃的血脉

汪维辉至今难忘求学的时光,那里的人和事深深影响着他人生的轨迹、治学根基。

恢复高考那年,汪维辉热血沸腾地



汪维辉在图书馆。

受访者供图

填报了数学专业,最终却阴差阳错成为了一名宁波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班的新生。在学校与当地小学共用的一幢校舍里,汪维辉一步步走进了语言研究的世界。

尽管条件简陋,图书馆不足10平方米,教材也是临时油印的讲义,但大家都如久旱盼甘霖似地渴望读书。

为了攻克自己前后鼻音、平翘舌音不分的弱点,汪维辉每天清晨会早早骑车到学校,在小池塘边捧着散文大声朗读,手里拿一支铅笔,凡是读音没有把握的字就做出记号,回到教室后立马查词典确认,并记住正确的读音。为了节省纸张,他用很小的字密密麻麻地记下课室内容,同学戏称为“细密字”。

老师们的循循善诱,也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汪维辉的人格。当时,有位老师写的板书工工整整,汪维辉特别留心他的省略号,从来都是标准的六点,不会多也不会少。

这种严谨的作风如一粒种子落进汪维辉心里,生根发芽。他现在给学生改论文,还会连同标点符号和错别字一起改:“刚开始做学术的学生要看顾好,不然容易走弯路,费精力。”

1995年,汪维辉考入四川大学攻读博士学位,师从语言学泰斗张永言先生。从那时起,他的研究方向渐渐明晰——汉语常用词。

为什么是常用词?汪维辉把那些生僻、少见的词,比作考古中捡拾的“奇珍异宝”,但他认为语言最活跃的血脉,藏在“我们每天说的‘走’‘跑’‘红’等常用词里”。

入学当年,师徒两人就合写过文章《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》,引起学界的热烈反响。汪维辉的博士论文



汪维辉在浙大做讲座。

受访者供图



汪维辉与学生合影。

受访者供图



汪维辉(右一)带着学生外出郊游。

受访者供图

没有严谨,就没有学问。
——汪维辉

人物名片

汪维辉,浙江宁波人。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曾任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。

长期致力研究汉语词汇史、中古近代汉语和训诂学,出版《东汉—隋常用词演变研究》《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》等多部著作,是首位系统研究“历时演变”与“方言分布”结合的学者,2024年被增补为《汉语大词典》(第二版)副主编。多次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研究成果奖、王力语言学家奖、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荣誉。

出的讲课方式和饱含干货的课堂内容,成为学校的“网红课”。

这两门课甚至还得到许多理工科学生的青睐。有一回,一位学生冒着瓢泼大雨从玉泉校区赶到紫金港校区,为正在做考试收尾工作的汪维辉送上一份零食大礼包,称自己被老师的治学精神所感染,以此表达敬意。

汪维辉写得一手漂亮的行书,上课时均用竖排繁体字。每节课前,他都会在黑板上用繁体字竖行抄写一段古文,让学生上台标点。他要求学生作业也用繁体字书写,考试包含繁体字识读。

很多同学起初叫苦不迭,但汪维辉坚持认为繁体字是学习古汉语的“敲门砖”,这能让他们更好地理解汉字的构字理据。

大部分时间,古代汉语学习是枯燥、难懂的,汪维辉主张讲课要注重启发而非灌输。比如《论语》中的“学而优则仕”,通常解释是“学习优秀了去做官”,汪维辉则会引导学生思考,“优”在先秦主要是什么意思,《说文解字》怎么解释,《诗经》里“优”怎么用。

通过文献查考,大家发现“优”在先秦有“有余裕”之意,这句话更合理的解释是“学习有了余力才去做官”。“学生听到这种解释,自然会觉得饶有趣味。”汪维辉说,这就叫“让语言本身说话”。

在他看来,汉语是历史悠久、使用人口众多、文献极为丰富且从未中断、方言差异无比纷繁复杂的重要语言,我们理应有一部规划宏大、叙述详尽的《汉语词汇史》。

“我这辈子当然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,但是只要汉语语言研究后继有人,一代代做下去,一定能达成这个目标。”汪维辉说。

因此,对于教书育人,他堪称极致的完美主义者。学生的论文初稿到他手里,基本都是“满篇红”返回去,学生和同行直呼“汪老师的眼睛最毒”。

“做语言研究,文字功底很重要。”汪维辉以莫泊桑《项链》为例,“她颤抖着打开盒子,里面空空如也”的“空空如也”一词,莫泊桑曾修改47次才定稿。总之,要把每个词和每句话都安放妥帖,文章才算写成。

望之俨然,即之也温。平日里,不论事务有多繁忙,只要和学生有关的事,汪维辉立马放下手头工作优先处理,学生的事就是天大的事。

浙大的一次毕业典礼上,汪维辉作为教师代表发言。他说:“我希望你们记住两件事:一是做学问要严谨,因为学术是求真的事业;二是待人要诚恳,因为人生是求善的旅程。求真与求善,是我们一生的功课。”

严谨治学,诚恳待人。汪维辉正透过三尺讲台,用一笔一画、一言一行,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力棒稳稳传递下去。

让汉语言研究后继有人

作为一名大学教师,汪维辉享受着“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”的快乐。

他的治学原则,源于恩师杨荫骀——让语言本身说话、全面不矛盾、经济(指行文简洁、没有废话)。这三条原则让汪维辉得益极大,沿用至今。

在浙大,汪维辉为本科生开设了《古代汉语》和《汉语史》两门课,因为深入浅

链接

汪维辉著作一览

一、《东汉—隋常用词演变研究》
全书共5章,选取东汉至隋代41组意义相同相近的汉语常用词,分名词、动词、形容词三类,编排用例并加描写,以说明这些常用词在历史上的演变替代过程。该书是首次对中古时期常用词做集中研究,具有开创性意义,并获得了第九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二等奖。

二、《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》
该书研究汉语中的100个核心词,通过广泛调查历史文献和现代汉语方言资料,厘清这些词的历史演变线索及方言分布情况。全书分为上、下两编:上编为总论,概述汉语核心词研究的相关问

题及主要结论;下编为分论,逐个描述核心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,其中历时演变和方言差异是研究的重点。入选201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。

三、《汉语词汇史新探三集》
此书为“汉语词汇史新探”系列的第三部论文集,接续《汉语词汇史新探》与《汉语词汇史新探续集》,收录汪维辉2017年以来的相关论文30篇,集中呈现了他在汉语词汇史领域的最新成果。全书内容涵盖汉语史和词义史的理论探讨、词汇史和语法史的个案研究、文献解读和语料学、训诂学理论与实践、辞书学、吴语研究、域外借词探源等。
(本报记者 王雨红 整理)